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沃勒斯坦精粹 /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黄光耀,洪霞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144-0

I. 沃... II. ①沃...②黄...③洪... III.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集 IV. F1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3)第 065719号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 2000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登记号 图字:10-2002-099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沃勒斯坦精粹

原 著 者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译 者 黄光耀 洪 霞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p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p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50千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2次印刷

ISBN 7-305-04144-0/C·126

定 价 33.00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 前言 1
- 导言 1

## 第一部分 走向世界体系分析之路

- 1. 西非的种族和民族整合 3
- 2. 法农和革命阶级 17
- 3. 自由社会中的激进知识分子 42
- 4.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非洲 50

## 第二部分 世界体系分析和社会科学

- 5.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  
比较分析观 93
- 6. 现代化：在行进中的安魂曲 135
- 7. 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世界体系的发展？ 142
- 8. 世界体系分析 162
- 9. 紧握舵柄：论分析的方法和单位 186

- 10. 时间和时段：非排除的中时段，  
或对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思考 199
- 11. 我们凭什么划分社会研究，为谁  
且何时划分社会研究 212
- 12. 社会科学和公正社会的寻求 229

###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度

- 13. 资本主义进程中的长波段 253
- 14. 1800年前的世界经济中的商品链  
(与托伦斯·K. 霍普金斯合作) 270
- 15. 作为世界经济制度之一的家  
(与琼·史密斯合作) 283
- 16.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中的三个  
霸权实例 304
- 17.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  
战场的文化 316

### 第四部分 世界体系中的分裂： 种族、民族、阶级、族裔划分与性别

- 18. 人民身份的构成：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族裔划分 347
- 19. 印度存在吗？ 367
- 20.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阶级形成 373
- 21. 作为概念和现实的资产阶级 384
- 22.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紧张：  
普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407

## 第五部分 抵抗,希望和诱惑

- 23. 1968年,世界体系中的革命:  
命题和疑问 419
- 24. 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插曲,  
或对当代历史的解释 438
- 25. 美国和世界:今天、昨天和明天 451
- 26. 自由主义的痛苦:进步的希望是什么? 481
- 27. 和平、稳定和合法性:  
1990—2025/2050年 503
- 28. 什么样的现代性终结 526
  
- 译后记 547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

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 前言

我曾将我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题献给托伦斯·K·霍普金斯 (Terence K. Hopkins), 以感谢他对我著述的长期影响。1974 年时, 我对已逝的 20 年一直铭记在心, 然而自那以后我们又有 20 年的友谊和合作。尽管他已离开了我们, 但我宁愿说他没有走, 他留下的遗产将令深深了解他的人们永远怀念。

将我 30 多年的写作汇集成册, 我需要公开表达许多其他的致谢。从教育方面来说, 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它的一般通材教育计划的产物, 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产物, 该系可能是 1950 年代世界社会学界唯一最有影响的并且专注于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阐释的系科。我的将许多领域的知识加以综合的努力确实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通材教育传统。我与社会学研究生项目的关系就更加广泛。就社会科学模式而言, 我基本上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逆者。在与当时正统观点和总是在学术上严

肃努力的人的争论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毫无疑问我开始了学术训练的起点。

在哥伦比亚,有许多教授(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我的同事)在学术上令我激动因此对我影响很大:马克·范·道伦(Mark Van Doren)既充满智慧又令人不悦的粗俗;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专注于阐明道德选择和学术争论之间的联系;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热衷于学术炫耀和追逐潮流;罗伯特·S.林德(Robert S. Lynd)信守毕生的政治承诺;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总是促使我去寻找强有力的证据以捍卫我与他的政治不同点。

xii 还有许多处在同一年龄段的同事,我同他们共同进行学术探讨,同他们(还有霍普金斯)争论、辩论和讨论了30多年。有三位同我一起组成了“四人帮”——塞米尔·阿明(Samir Amin)、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冈德尔·弗朗克(Gunder Frank)。我们一同写了两本书并且一同参加了无数次非正式聚会。我总是说我赞同他们各自观点的80%。近年来,我赞同冈德尔·弗朗克的比例已经下降。但是他们都与保持着学术上和个人的友谊。是否要列出所有我同他们合作过的其他人的名单我感到为难。但是我至少应列出下列我与他们进行过亲密合作的人:在德国的奥托·克莱叶(Otto Kreye)、在法国的埃提纳·巴里贝(Etienne Balibar)、在墨西哥的帕比罗·冈萨雷斯·卡萨诺娃(Pablo González Casanova)和在埃及、法国的安诺尔·阿卜杜勒-马莱克(Anouar AbdelMalek)。

就在哥伦比亚、麦基尔(McGill)和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我的学生而言,他们是鞭策我的无尽动力源泉,使我作为一名教授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但是名单太长,我只能感谢他们(已不再是学生)中的四位,是他们向我包括这本书提出

认真严肃的建议。他们是沃利·高德弗朗克 (Wally Goldfrank)、比尔·马丁 (Bill Martin)、里查德·李 (Richard Lee) 和乔治·德鲁吉安 (Georgi Derjugin)。

最后我要特别对贝特里斯 (Beatrice) 表达谢意, 在许多关键时刻贝特里斯都和我站在一起并给我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这些建议我总是很少采纳。我承诺将改进。



我的学术生涯就是苦苦寻求我和其他人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当代现实的恰当的解释。对我自己或对任何人来说,这种寻求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我总感觉这种寻求的学术性和政治性是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一存在。

我猜想当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上中学时就开始了上述寻求。我的家庭充满政治意识并且世界事务常常在我们家成为讨论的话题。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我们首先关注的。我们也强烈意识到,那个时代全球左派在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巨大分裂的存在。即使在战时一致和相对缓和的氛围下,界分两个国际的观点仍然相当突出。对我来说,它们在美国本地的反映就是在纽约自由党和美国劳工党之间的政治分野。当我在 1974 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我年轻时代校园的最活跃的政治组织是美国老兵委员会 (AVC)。尽管我太年轻没有成为一名老兵,但是我参加了老兵委员会

xv

的公共集会，并且目睹它被同样的分裂造成的解体（和毁灭）。

我本人对这些争论的反应比较复杂。我相信社会民主党对共产主义的所有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邪恶和恐怖、无原则地改变党的路线、毫无生气（*Langue de bois*）。然而与此同时，我相信共产主义者对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一切评价——逐渐堕落到西方民族主义、令人难以置信地削弱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反对以及对种族歧视缺乏严肃战斗性。

从政治方面来说，这使我陷入了我曾一直进行抗争的困境。从学术上来说，它使我重又面临了一系列这些年我在写作过程中遭遇的问题：我所称的反体系运动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活动是如何被体系束缚而结构化，这种束缚使他们从来都不能充分地解脱出来。简而言之，为了理解他们如何去做他们已做的事情，同时更好地形成目前真正有用的政治观点，我开始将这些运动历史化。

1945—1950年早期的冷战时期是令人兴奋的日子，那时什么似乎都是可能的。对我（也对许多其他人）来说，这一时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结束。突然反共产主义的影响四处蔓延，同时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兴盛。1951—1953年间，我在美国军队服役，当我回到哥伦比亚时，我决定以作为美国政治分化现象的麦卡锡主义为题撰写我的学位论文。我吸收了米尔斯（W right Mills）在《劳动的新人》一书中阐述的老练世故的保守派和实用的右派之间的不同特点，论证麦卡锡主义是实用右派的组成部分，仅仅稍稍涉及共产主义者，事实上直接首先反对的是世故的保守派。这是一篇被广为赞同的论文，在当时被广泛引用。我自我感觉应该把自己看成用 1950年代的语言说是一位“政治社会学家”。

尽管如此，我不打算把美国政治学作为我学术研究的首

要领域。自我中学毕业以来,我对非欧洲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特别关注现代印度的一系列事件,并阅读了大量甘地和尼赫鲁的著作。1951年,我参加了一个国际青年会议,在那儿我结识许多来自非洲的代表,他们比我年长并已经在他们国家担任重要政治职务。1952年,另一次青年会议在塞内加尔的达喀(Dakar)举行。突然我发现我自己处于不久成为独立运动(比如法属西非)的动乱之中。

我决定把非洲作为我学术研究和持久努力的焦点。由于我会讲法语并有广泛的联系,我成为跃过欧洲语言障碍而研究非洲的少数学者之一。1955年,我获得“福特非洲合作基金”(Ford Foundation African Fellowship)到非洲进行研究和撰写关于黄金海岸(加纳)和象牙海岸志愿协会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中的地位学位论文。当时我成为一名非洲学者,这种学术的角色一直持续了20年。我写了许多关于非洲主题和问题的著作和论文。1973年,我成为“非洲研究协会”(美国)的主席。大约20年时间内,我设法游历了全非洲,可能到过独立国家中的四分之三。

如果说我的学术探求导致我早年远离我自己的祖国来到当时的非洲——我第一次访问并开始研究非洲时,非洲仍是个殖民地大陆——那是因为我对于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在20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为摆脱西方世界的控制而进行的斗争事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今天我们称这是与北南关系或核心—边缘关系或欧洲中心论相关的问题。

据说,20世纪50年代以及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我的那些最重要的评价不被广泛地接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些人所说的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冷战和另外一些人所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有这些名词都被相当狭义地加以界定)是(确实有许多表现存在)我们时代的中心讨论话

题。因此我的探索不仅反对政治学术领域中广泛接受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且反对源于这种主流的、我自己内心深处存在的观点的各种概念。非洲虽然不再是我研究工作的主要焦点,但是,我坚信我的非洲研究是用开放的眼光看待当代世界的激烈的政治问题以及看待如何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历史的学术问题的。正是非洲对我所受教育的比较愚蠢的部分提出了挑战。

起初我认为学术和政治上的争论仅仅包括对当代现实的实际分析,但是不久我开始意识到正是分析的方法本身值得怀疑。我被教会的各种方法对我来说似乎限制了我们的实际分析,并且曲解了我们的解释。渐渐地,大约有 20 多年时间,我的观点得到发展。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开始声称我正在试图从长远的角度即我所称的“世界体系分析”,来考察世界。这涉及到两个主要的学术选择,第一个是最关键的即“分析的单位”的选择,唯一合理的分析单位是一个“世界体系”,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是一个“历史社会体系”。

第二个学术选择是抛弃所谓的强固和划分所有现代社会科学——即强固和划分描述性研究 (idiographic, 研究特殊规律的) 的人文学科和规范性研究 (nomothetic, 研究普遍规律的) 的科学的方法论之争——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辩论。通过选择所有和各种各样的要求我去做的各方面,我开始相信——开始时凭直觉,后来则更加理性——如果所有的分析被认真地用以对真实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那么这些分析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

xviii

有关我的学术工作的两个基本前提,即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分析的单位 and 坚持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将在本书的有关论文中得到阐述。当我第一次提出它们时,没有一个前提受到欢迎或受到热烈欢迎。第一个

前提成为我的标签而且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比较详细地提出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的一个单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其次是在本书第五篇论文中重提。《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和本书第五篇论文均发表于1974年,受到较多的赞成。有的人完全接受,也有的只承认应认真对待我的论点。反驳最激烈的人常常并不是在实际领域(基于它事实上的纠正)反对它,而是在认识领域(因为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能伪造的主张)。

因此我发现单单争论对真实世界的不同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论争是我们如何能知道哪种描述实际上是正确的,或比另外一种更正确,或更合理,或更有用。为了我和其他人所从事的将社会过程作为相互结合的、复杂的整体的分析研究得到承认,我必须同认识论上的观点进行论战,本书第二部分的论文阐述了我是如何逐渐将注意力转到认识论领域的论争和那些暗含有对社会现实的不同视野的方法。

我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实际的结果。我觉得上述两个前提能够使我们重新解释许多昔日的争论并能够收集到各种新的和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依我看确实能说明当代的现实。特别是这种经过修正的观察社会现实的方法不仅阐明了关于在建设现存的世界体系方面的历史选择,而且还阐明了我们在未来建设成功的世界体系(或各种体系)时将必须作出的选择。世界体系分析使我们能涉及广泛的具体问题,但这些具体问题最终可能都会结合在一起。不是世界体系分析能使我“发现真理”,而是世界体系分析能使我按照我认为更加有利于我们大家作出政治和道德决定的方式,对社会现实作出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世界体系分析还能够使我在恒久的结构和那些我们通常使其具体成各种流行理论的短暂表达之间加以区别。最近的热门话题所谓的“全球化”就是

后者的一个例子。

我把我的精力投入于对现代世界体系（我坚持这是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功能和发展的解释。我力图解释它的制度性的矛盾、它的历史源起和我认为它已进入体系性危机、因而正由混沌向一个新秩序转换的时期的原因。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包括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制度结构的分析性阐述——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周期、商品链、家庭收入共享、国际体系和它的霸权周期以及地缘文化——此外还包括对作为一个解释模式（现代化理论）的民族发展和发展主义的详细的评论。

“世界体系”术语常常引起对平衡和一致的联想。在我的思想中这有最深入的解释。的确，关于体系的最有趣的事情是所有的体系是如何会有深深的分裂的，它们正在通过制度化而试图限制这种分裂。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和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kman）很久以前都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在减少内部冲突或甚至在避免使用暴力形式方面各种体系从来都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这同样是事实。这种理解仍然是我们从卡尔·马克思著作中获得的主要遗产。

进一步说，当我们共同地对最近的几十年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了解的时候，在任何历史体系中都存在着不只一个的分裂。因此我开始花费精力试图分析哪一种分裂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是主要的分裂、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不同和相互关联的以及每一种分裂是如何限制了其他分裂的作用的。这些都是第四部分的主题，我试图从语义上分析我所认为的我们现代世界存在的五个主要分裂：人种、民族、阶级、种族和性别。

最后，我转向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怎么办。我将第五部分称为“抵抗，希望和诱惑”。这些词语对我来说正好描述了